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Take the China-US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as an Example

LU Chunying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10, 2022

Accepted: May 3, 2022

Published: June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LU Chunying. (2022).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Take the China-US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153–15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9.p](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9.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9.p>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entitled A Corpus-based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Keywords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ponsored b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Jishou University (21SKY47).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task but also a tool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petition. It's urgent for u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our work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demonstrate a real, three-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China, in whic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also matt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is mainly in the form of symbols, and little attention is given to pictures, images, audio and other multi-modal forms. The latter, however, is often more intuitive and vivid, which can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angle and three-dimension, increasing audience cover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ina-US Alaska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i. e., verbal modal and non-verbal 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hope of shedding some light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diplomatic discourse; multi-modal perspective; China-US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LU Chunying is an MTI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and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Her email address is 365930205@qq.com.

多模態話語視角下中國外交話語翻譯管窺

——以中美阿拉斯加高層戰略對話為例

盧春英

吉首大學

摘要:翻譯工作在外交領域既是一項政治任務,也是國際政治鬥爭的工具。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刻不容緩。其中外交話語的對外翻譯傳播對於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更是必不可少。本研究發現中國外交話語的對外傳播主要是以符號形式的文字介質為主,較少關注圖片、影像、音頻等多模態形式,而後者往往更為直觀、生動,能夠多角度、立體式地增強傳播效果,擴大受眾覆蓋面。本文選擇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為視角,聚焦中美阿拉斯加高層戰略對話,從語言模態話語分析和非語言模態話語分析兩個層面加以考察,以期為中國外交話語翻譯提供一點借鑒。

關鍵詞:中國外交話語英譯;多模態視角;中美高層戰略對話

基金項目:吉首大學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基於語料庫的習近平對外話語關鍵詞英譯研究——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為例(項目編號 21SKY47)」之階段性成果。

引言

2021年3月18日在美國安克雷奇舉行的中美阿拉斯加「2+2」對話很可能被載入史冊,在中美關係處於十字路口的重要關頭,恰逢其時。此次戰略對話是中美最近幾十年前所未有公開面對面的交鋒,在這次對話中,雙方都亮明了態度,把兩國的主要矛盾都攤開了,使得雙方增進相互了解,避免彼此戰略誤判。與此同時,世界在解讀對話傳出的信息,也在觀察中美關係未來的走向。在外交領域,翻譯工作與政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意義重大,外交話語的翻譯更是如此。本文將聚焦中美阿拉斯加高層戰略對話,將其置於多模態話語分析的視角下來進行管窺,從語言模態話語分析和非語言模態話語分析兩個層面加以考察,為中國外交話語翻譯提供借鑒。

一、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

多模態話語指運用聽覺、視覺、觸覺等多種感覺,通過語言、圖像、聲音、動作等多種手段和符號資源進行交際的現象(張德祿,2009)。多模態話語指同時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模態的話語(Kress & Van Leeuwen, 1996:183;朱永生,2007)。多模態話語是在批評話語分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結合了社會符號學和話語分析,因而也被稱為批評性符號學(critical social semiotics)(鄭海翠、張邁曾,2008:110)。

多模態話語理論上的出發點是韓禮德(1978)語言是社會符號的思想。韓禮德(1985, 1994)元功能理論認為不管是口頭語篇還是書面語篇,在表達思想的過程中總是同時完成三個元功能,即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語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意義不僅通過語言還通過其他很

多模態表達,包括圖像、手勢、姿勢、目光、顏色等等,這些模態不僅是話語的體現,而且在具體情況下與與話語具有同等的意義構建潛能(Borodo, 2015)。在多模態話語中,不同模態互相交織,共同構建意義(Braun, 2011; Ketola, 2016)。

多模態話語分析指在進行話語分析時,不僅關注語言模態,還要關注聲音、圖像、動作、表情等多種非語言模態。多模態話語分析接受了系統功能語言學關於語言是社會符號的意義潛勢的觀點,認為非語言符號也是意義的源泉(朱永生, 2007)。多模態話語分析的蓬勃發展以《閱讀圖像——視覺設計語法》(Van Leeuwen & Kress, 1996)的標誌。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發展了話語分析理論,拓寬了研究視角,使話語分析更加客觀、全面、可信。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自 20 世紀 90 年代在西方興起以來,相關研究開展得如火如荼。國內外多模態話語分析的代表學者有 Kress & Van Leeuwen(1996, 2001); Van Leeuwen & Jewitt(2001); Kress(2009); 李戰子(2003); 朱永生(2007); 胡壯麟(2007); 張德祿(2009)等。多模態話語理論以韓禮德(1985/1994)功能語法為基礎,把語言作為社會符號所具有的三大元功能延伸到除語言之外的圖像、音樂、顏色、印刷版式等其他符號(Hodge & Kress, 1988; Kress & Van Leeuwen, 1996/2006; Van Leeuwen, 1999; Kress & Van Leeuwen, 2002; Van Leeuwen, 2006; Baldry & Thibault, 2006), 並把這些符號看作是各自獨立、而又互相作用的符號資源,在分析語言特征的同時,強調圖像、聲音、顏色和印刷版式等視覺、聽覺和行為方面符號模態在話語中的作用。疫情當下,多模態話語分析也在發揮其作用。鄧誼、馮德正(2021)結合多模態話語分析構建了多維度框架,對新冠疫情期間企業微信推文的話語類型、語步、交際目的和多模態符號資源進行質性和量化分析,有助於我國企業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提高溝通水平、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啟示。

二、語言模態話語分析

在此次中美高層阿拉斯加戰略對話中的主要人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以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除此之外還有中方翻譯張京,以及美方翻譯鐘嵐(Lam Chung-Pollpeter)。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其他技術開始用於語言信息的傳播,但從傳統的語言學研究的角度講,實現意義傳播的媒體形式主要有兩種:聲波傳導的聲音符號和由筆等生成的書寫符號。這兩種媒體是語言傳播信息的主要媒介(張德祿, 2009)。鑒於外交話語的政治敏感性極強,對其翻譯應堅持「政治等效」標準。其內涵是:外交翻譯一方面準確、忠實反映源語和說話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語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譯語來表達,使雙方的政治含義信息等值,使譯文能起到與原文相同或相似的交際功能;同時從政治性、動態性和平衡性三個維度對外交翻譯原則提出具體要求。(楊明星, 2008)。因此,進行多模態話語分析時,文本主體或者是言語元素是我們需要註意的,如譯文選詞、用詞等。

例 1

楊潔篪:我現在講一句,美國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

張京譯: So let me say here that,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sid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the qualification to say that it wants to speak to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這句話無疑是楊主任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此前言論的一個「以牙還牙」。3月初,布林肯曾有言: We need to be approaching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鐘嵐將這句話翻譯成:我們需要從實力的地位上出發和中國交流。這樣一聽,讓人感覺美方十分咄咄逼人。筆者非常贊同楊主任關於中美應該平等相待的觀點和發言。但是如果從純語言模態角度來看,「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並不能將其簡單直譯成「從實力的地位出發」。根據 Merriam Webster, 該短語的意思是: a position that gives an advantage, 也就是「有優勢的位



置」。筆者認為布林肯想要表達的是：美國在與中國相處的過程中要揚長避短，採取的方式要有利於本國自身發展。筆者認為張京的譯文與楊主任想要表達的意思與傳達的態度高度一致。

例 2

楊潔篪：二十年、三十年前你們就沒有這個地位講這個話，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

張京譯：Now the US side was not even qualified to say such things even 20 years or 30 years back,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這句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回應。由於美方翻譯的失誤，令雙方產生了誤解，現場火藥味十足。「不吃這一套」等屬於中文當中的習慣用語、俗語、成語範疇，意思是「不買賬、不接受」，語言生動形象。將其泛化成「this is not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Chinese people」(即：「這不是與中國打交道的方法」)，意思雖與中文基本相符，但語氣比較緩和，無法表達出楊主任當時義憤填膺的感情。筆者發現譚載喜教授對此進行了重譯，將其處理為：「...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just don't buy it!」通過查證，筆者發現英美國家的人口語中想要表達「信以為真，多數會用」「buy it」表示，比如「I don't buy it」的意思其實是「我才不相信呢，我不吃那一套！所以筆者認為譚譯更生動形象，且更加符合英語國家人的說話方式，在語氣上也更能保持與原文一樣的較高強度。

例 3

王毅：……我認為這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但如果美方試圖以此舉來所謂增強你們對華的優勢的話，我想恐怕也是打錯了算盤……。

張京譯：... This is not supposed to be the way one should welcome his guests. And we wonder if this is a decision made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try to gain some advantage in dealing with China, but certainly this is miscalculated...

楊潔篪第一次發表完講話之後，緊接著發言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當即接過話頭，對美方進行駁斥。「我想恐怕也是」的語氣軟中帶硬，綿裏藏針，作為一句話的開頭起到軟化語氣的效果。如果用「but certainly this is miscalculated」(「但這肯定是……」)則可能過於肯定與強硬，不符合外交禮儀，不利於談話目的的達成。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將其處理為「I'm afraid...」則可能更為符合說話人想表達的語氣，更能準確傳播原文的文化政治涵義。

例 4

王毅：這也是中美兩國可以相向而行的交匯點。

張京譯：It is also a place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meet each other halfway.

中方代表團應美方邀請來到中美兩國航線的中點——安克雷奇，王外長借此也表達了中方的態度立場。「相向而行」是一個漢語詞匯，意思是：朝對方的方向行進，即面對面行進。如果採用釋義，就無法言簡意賅。「相向而行」筆者認為意思就是「半路相見」。這裏中方譯員得「意」忘「形」，以一種直接的方式準確傳達出源語意思，且字數還是對等，符合外國人「開門見山」的思維方式，有利於信息的傳播。

例 5

王毅：美國人的這個老毛病要改一改了！

張京譯：This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issue and it should be changed.

「老毛病」是中國人常用的俗文俚語中的一種，用以形容 1. 經常犯的病；2. 經常出現的缺點。這裏無疑是第二種意思，指的是美方肆意干涉中國內政的霸權主義做法，算是一種「重大的議題」。如果將其處理為「disease」就望文生義，與說話人想要表達的意思大相徑庭。如果處理為「shortcoming」等詞，語則無法體現出問題的嚴重性而且也不夠正式。根據 Merriam Webster, issue 意指 something that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etc. : an important subject or topic。故中國譯員將其處理為「a long-standing issue」很好的傳達了說話人的意思,有效促進中國外交思想的傳播。

目前中國外交話語對外翻譯傳播主要依賴符號形式中的文字介質,雖然方式過於單一,有待拓寬,但是符號形式中的文字介質的力量也不容小覷,應該予以重視。張京的從容應對,已顯示出其高超的翻譯能力以及過硬的心理素質,縱使在一些專家學者們看來現場的譯文仍有完善的余地,但瑕不掩瑜。專家學者們其實更多的是站在一個事後學術層面來進行的一個探討,以期給學習者啟發。二者並行不悖。

三、非语言模态话语分析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特別是隨著數字、網絡和多媒體技術的廣泛使用,多模態交流已經成為社會交流的主流,視覺符號以及其他傳統習慣中被人們認為是副語言的圖像、音樂、顏色等符號,越來越多地處於突出、甚至優勢和中心地位(韋琴紅,2009)。這些符號不再僅僅是一種交流的形式,而是一種表達意義的非語言模態手段。因此,進行多模態話語分析時,雖然語言仍是分析的重要內容,但應放在一個更大的多模態語境中進行,並考慮語言與多模態語境的關係(Jewitt,2009:2)。



圖 1



圖 2

來源: Microsoft Bing



我們需要關注超文本或者副文本等非語言模態元素,包括翻譯傳播行為人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說話的語音、語氣、腔調等。服飾是各國歷史與文化發展的積澱,表現了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國際政治中的服飾符號通過彰顯民族文化特色、傳達國家外交理念、表征歷史文化交融、暗示國家政治背景等方面對國家形象進行建構,除此之外其還具有鮮明的文化傳播效應(王滢,2015)。在這樣一個嚴肅的外交場合,譯員本身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說話的語音、語氣、腔調等非語言模態元素,代表的就不僅僅是個人,而是國家的外交形象,目的不是嘩眾取寵,也不能喧賓奪主,所以需要符合一定的外交禮儀,外交規範。在此次高層對話中,中方派出的是現任外交部翻譯司高級翻譯張京,美方派出的是曾經特朗普執政時期的禦用翻譯鐘嵐(Lam Chung-Pollpeter)。「欲猜虞之類泯,必形跡之渾忘,……若服色顯有異同,斯舉動每多拙格」,容易引起他人的側目歧視,「明示以族類之殊」。這樣「安能通彼惘忱,相洽於意言之表?情以睽而難合,勢以孤而罕儔,其不便於交際,關係尤巨」(王開璽,2001)。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層戰略對話中,美方翻譯人員「染紫頭發」,身著異裝,與該環境相比顯得格格不入,與其余身著黑色西裝的與會者相比,顯得不莊重、不專業、不得體(如圖 1 所示)。除此之外,在官方發布的長達 1 小時 6 分 34 秒的會談視頻中,鐘嵐分別於 20 秒時將秩(zhi)序,誤讀成秩(chi)序,53 分 29 秒對於楊潔篪的稱謂「楊主任」有明顯遲疑,53 分 37 秒直接稱呼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為「沙利文官」並且整個翻譯有很多語氣詞、口頭禪。會後,鐘嵐不僅遭到美國媒體的批評,其翻譯能力也備受外界質疑。事實上,鐘嵐畢業於號稱翻譯界「哈佛大學」的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被認為是三位美國頂級中文翻譯官中水平最高的。資料顯示,她於 2017 年成為美國國務院正式員工,還是特朗普執政時期的「總統禦用翻譯」,曾多次參與中美領導人會談。對於許多人心中「為何美方翻譯水平如此之糟糕」的疑問,一些業內權威人士也作了分析:其實水平並不差,但發揮是真失常。此次高層戰略對話的目的就是為了中美兩國能夠在戰略和政治層面進行深入溝通,增進互信,和平共處。美方譯員的儀表無疑不利於對話的順利進行,而且該美方譯員的翻譯能力也備受質疑,通過比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言原文和翻譯員譯文後發現,該翻譯員的譯文大有「火上澆油」、「夾帶私貨」的意味,從說話的語氣、腔調到語句措辭,對比布林肯的原文更生硬,而且更顯居高臨下,更具有攻擊性。相比之下,中美高層戰略對話的現場交鋒中,中方譯員張京儀表莊重、大方、得體(如圖 2 所示)。說話語氣、腔調、遣詞造句,總體而言均十分得體到位,與原文保持了一致,有效達到了忠實翻譯傳播原文行為者原意義的目的。會上,張京曾就中方發言人的 16 分鐘發言進行翻譯,她臨危不亂,以大氣沈穩的翻譯風格以及準確完整的內容表達,充分展現出我國的外交風采。其還在和楊潔篪以及布林肯的一番互動中不經意間緩和了現場緊張氣氛。其大方得體的儀表,出色的翻譯能力及現場輕鬆表現,皆稱得上中國外交話語翻譯傳播的優秀範例。

結語

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渴望聽到中國的聲音,中國也迫切想要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因此翻譯任重道遠。翻譯本身是一項有目的的行為,涉及不同文化和社會政治信息的交流,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活動過程,其產生於特定文化政治語境,受製於該文化政治並為其服務。在不同國家的人之間,翻譯起到媒介,橋梁的作用,讓人們能夠互相溝通,減少誤解,增進互信,意義重大。外交話語的翻譯更是如此。輿論是靠爭取認同來取得力量的,只有爭取認同,才能推動關注的聚集。那種以勢壓人的強勢傳播得不到認同,所以沒有輿論力量(鄒振東,2021:45)。一個合格的譯員除了需要對自己所翻譯的每一句話高度負責外,本身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說話的語音、語氣、腔調等非語言模態方面也要重視,更何況是在這樣一個嚴肅的外交場合,譯員們所代表的早就不僅僅只是個人,而是一個國家的外交形象,所以需要紮實的翻譯能力,以及符合一定的外交禮儀,外交規範。話語傳播形式包括物質形式和符號形式(胡開寶、張晨夏,2021)。目前中國外交

話語對外翻譯傳播主要依賴符號形式中的文字介質,固在符號形式上,我們可以利用各類新聞媒體傳播介質,加強音頻、圖片和影像等多模態符號形式傳播(同上)。本研究所采取的分析視角,對中國外交話語對外翻譯傳播有借鑒意義。但由於主客觀原因,本研究不足之處,還望斧正。

注釋

- ① Baldry, A. & Thibault, P. J. (2006). *Multimodal transcription and text analysis*. London: Equinox.
- ② Borodo, M. (2015). Multimodality, translation and comic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3(1): 22-41.
- ③ Braun, S. (2011). Creating coherence in audio description.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56(3): 645-662.
- ④ LI Zhengshuan & GUO Xiaoqian. (2021). A study of "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4), 1-8.
- ⑤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Edward Arnold.
- ⑥ Hodge, R. & Kress, G. (1988). *Social semio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⑦ Jewitt, C. (2009).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⑧ Ketola, A. (2016). Towards a multimodally oriented theory of translation: 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the translation of illustrated technical texts. *Translation Studies*, 9(1): 67-81.
- ⑨ Kress, G. & Van, L. T. (1996/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 ⑩ Kress, G. & Van, L. T. (2002). "Color as a semiotic ode: Notes towards a grammar of color". *Visual Communication*, 1(3).
- ⑪ Kress, G. (2009).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⑫ Kress, G. & Van, L. T.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 ⑬ Van, L. T. (1999). *Speech, music, sound*. London: Macmillan.
- ⑭ Van, L. T. & Jewitt, C. (2001). *Handbook of visual analysis*. London: Sage.
- ⑮ Van, L. T. (2006). Towards a semiotics of typography.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14 (2): 139-155.
- ⑯ 鄧誼、馮德正:《公共衛生危機中企業社會責任的多模態話語建構》,《外語教學》2021年第5期,頁13-18。
- ⑰ 胡壯麟:《社會符號學研究中的多模態化》,《語言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1期,頁1-10。
- ⑱ 胡開寶、張晨夏:《中國當代外交話語核心概念對外傳播的現狀、問題與策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頁99-109。
- ⑲ 李戰子:《多模式話語的社會符號學分析》,《外語研究》2003年第5期,頁1-8、80。
- ⑳ 王滢:《國際政治中的服飾符號研究》,湖南師範大學2015年學位論文。
- ㉑ 王開璽:《傳統服飾與近代外交》,《安徽史學》2001年第2期,頁45-48。
- ㉒ 韋琴紅:《論多模態話語中的模態、媒介與情態》,《外語教學》2009年第4期,頁54-57。
- ㉓ 楊明星:《論外交語言翻譯的「政治等效」——以鄧小平外交理念「韜光養晦」的譯法為例》,《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頁90-94。
- ㉔ 朱永生:《多模態話語分析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外語學刊》2007年第5期,頁82-86。
- ㉕ 張德祿:《多模態話語分析綜合理論框架探索》,《中國外語》2009年第1期,頁24-30。
- ㉖ 鄒振東:《弱傳播》,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21年版,頁45。
- ㉗ 鄭海翠、張邁曾:《和諧理論的多模式話語建構》,《外語學刊》2008年第2期,頁107-112。

(Editors: LI Ruobing & Cherry LU)